

# 東北抗聯與兩次伯力會議再探 ——以蘇聯遠東戰略為中心

• 郝江東

**摘要：**東北抗日聯軍歷史上有兩次會議至關重要，因均在蘇聯遠東城市伯力召開，故均稱「伯力會議」。目前學界關於兩次伯力會議的研究，多以中共領導東北抗戰史或中國革命史為敘事框架，強調中共東北黨對會議召開的主導性。然而，愈來愈多的史料顯示，共產國際和蘇聯遠東方面軍對兩次會議的進行發揮了更具關鍵性和主導性的作用。如若忽視蘇聯因素的作用，關於兩次伯力會議的論述必定是不充分和不全面的。本文主要目的，即是通過梳理兩次伯力會議的緣起、進程及影響，揭示蘇聯對兩次會議產生的重要影響，尤其是如何整合、掌握與利用東北抗日力量，服務於自身的遠東戰略。

**關鍵詞：**東北抗日聯軍 周保中 伯力會議 共產國際 蘇聯遠東方面軍

東北抗日聯軍（以下簡稱「東北抗聯」）歷史上有兩次會議至關重要，因都在蘇聯遠東城市哈巴羅夫斯克（中方稱「伯力」）舉行，均稱「伯力會議」。第一次伯力會議召開於1939年底至1940年3月，參會者是蘇軍代表，吉東代表、東北抗聯第二路軍總指揮周保中，北滿代表、東北抗聯第三路軍政治委員馮仲雲，以及被蘇方任命為東北抗聯總司令的趙尚志，這是中國共產黨東北黨和東北抗聯領導人第一次集體越境。第二次伯力會議召開於1940年底至1941年春，參會者除蘇軍代表，還有以周保中、張壽錢（李兆麟）為首的東北主要領導人。兩次會議對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第一，就東北抗日運動接受蘇聯遠東方面軍（以下簡稱「遠東蘇軍」）的武器物資援助與政治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東北抗聯後期歷史檔案整理與研究（1938-1945）」（20CDJ017）的階段性成果。

軍事指導做出了原則性規定；第二，就東北抗聯轉變鬥爭策略、為蘇軍執行情報任務的內容與方式做了規定；第三，第二次伯力會議後，蘇軍強行留置參會的東北主要領導人直到抗戰結束，對東北抗日運動造成重大消極影響。

學界現有關於兩次伯力會議的研究多以東北抗戰史或中國革命史作為敘事線索，將蘇聯、共產國際與東北抗日運動的複雜互動作簡約化處理，有意或無意地規避蘇聯因素，或是倒置當時共產國際、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1952年改稱蘇聯共產黨，以下簡稱「聯共〔布〕」）與中共的胎生關係，以及領導、被領導的組織關係，格外突出中共東北黨對會議召開的主導性<sup>①</sup>。近來有些研究雖然關注到蘇聯因素，但缺少對蘇方決策與行為的描述，以及蘇方檔案的互證<sup>②</sup>。愈來愈多的史料顯示，蘇方對兩次會議的召開發揮了更具關鍵性和主導性的作用，如忽視蘇聯因素，關於兩次會議的緣起、進程及影響的論述必定是不完整的。本文旨在利用中俄雙邊檔案，通過梳理兩次會議的緣起與進程，揭示其間蘇聯因素發揮的作用。

## 一 莫斯科調整遠東戰略與趙尚志奉命回國

整個1930年代，莫斯科遠東戰略的基本目標是爭取與日本維持友好關係，盡可能降低蘇日兩國爆發戰爭的風險。斯大林為此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向日示好，包括出售中東鐵路、遷徙蘇聯遠東地區的中國與朝鮮移民、拒絕援助東北抗日運動、拒絕同國民黨政府簽訂任何形式的同盟條約等。這一戰略自1938年夏開始發生變化，導火索是時任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駐遠東全權代表留希科夫（Genrikh Lyushkov）叛逃日本，此一事件致使蘇聯遠東情報與軍事系統一夜間陷入崩潰<sup>③</sup>。接着蘇日在遠東地區接連爆發軍事衝突，如1938年7月21日雙方在烏蘇里江島嶼上的交火<sup>④</sup>。這些事態加劇了莫斯科對蘇日爆發大規模戰爭的擔憂。為重建遠東情報組織系統，以及防範潛在的蘇日大規模戰爭，莫斯科着手調整遠東戰略，而新的戰略框架就包含了加強與東北抗日運動互動的內容。

當莫斯科將目光轉向遠東之際，東北抗日運動正面臨失敗的絕境。自1935年中共滿洲省委被共產國際要求解散<sup>⑤</sup>，東北黨組織隨即四分五裂，分拆出南滿、吉東、北滿等省委，加上抗戰形勢嚴峻，它們均與中共中央失去直接聯繫，由此極大損害了東北抗日運動的發展。黨內矛盾突出體現在吉東與北滿省委之間<sup>⑥</sup>，北滿黨內也發生分裂<sup>⑦</sup>。儘管內爭不斷，各方在爭取蘇聯援助與指導方面卻有共識，都認為由於與中共中央失聯，與之接壤的蘇聯的援助攸關東北抗日運動的前途和命運，也因此都先後派代表到蘇聯尋求接洽或指示。只是受到當時莫斯科遠東戰略的影響，這些零散的越境行動大多無果而終。1938年初，周保中、趙尚志、戴鴻賓等東北主要領導人相繼越境尋求接洽，周保中無功而返，趙尚志、戴鴻賓及隨行人員則被逮捕並關押了一年之久<sup>⑧</sup>。

為深入了解東北黨與東北抗日運動的歷史與現實處境，莫斯科指示共產國際幹部部負責調查。1938年12月前後，共產國際幹部部找到當時在莫斯科工作的原中共滿洲省委負責人林莎(李伍先)、徐傑(陳潭秋)、趙毅敏(劉焜)等人，聽取關於東北抗日運動歷史的匯報<sup>⑨</sup>。共產國際幹部部還會同內務人民委員部，詳細調查了周保中等東北主要領導人的履歷並分別給出政治鑒定。其中對周保中的鑒定確認他積極對日作戰、捍衛黨的路線，切實執行了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具備卓越的政治軍事素養與豐富的政治軍事工作經驗，「在黨和游擊隊中有威信」，是一名「堅定的、有才能的、富有經驗的指揮官」<sup>⑩</sup>。基於多方調查結果，莫斯科確認了援助與利用東北抗日運動的可行性。

1938年底，遠東蘇軍情報負責人王新林即派人給周保中送信，邀請他到蘇聯會談，明確提出希望建立更密切的雙邊關係，以及希望東北抗聯能幫助蘇軍做情報工作。王新林在信中提出的基本原則是「互有幫助」<sup>⑪</sup>。1939年4月15日，蘇聯內務人民委員貝利亞(Lavrentiy P. Beria)和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Kliment Y. Voroshilov)聯名簽署了同時發給蘇聯遠東地區各內務局與國防委員部的命令，指示由蘇聯遠東軍事委員會負責援助東北抗日運動<sup>⑫</sup>。命令內容主要包括：第一，援助東北抗日力量並幫助整合、鞏固其組織體系；第二，挑選可靠的東北抗聯官兵為蘇軍做情報工作；第三，釋放被捕的趙尚志、戴鴻賓及隨行人員並派回東北執行上述任務，等等。這份命令的下發標誌着莫斯科對東北抗日運動的政策發生根本轉變。

5月30日，遠東第二獨立紅旗集團軍司令科涅夫(Ivan Konev)、軍事委員比留科夫(Nikolai Biryukov)等人接見了被釋放後即將返國的趙尚志和戴鴻賓。科涅夫任命趙尚志為東北抗聯總司令，強調將通過趙尚志與東北抗日運動建立關係，「就所有問題下達指令」，並下達了三項指示：一、整合與統一東北抗日力量；二、執行蘇軍情報任務並定期匯報；三、加強部隊的鋤奸與防諜工作。為避免引起與日方的糾紛，蘇軍領導人一再強調保密原則，要求任何情況下都不得透露到過蘇聯<sup>⑬</sup>。蘇軍領導人還允許趙尚志從當時滯留蘇聯的東北抗聯官兵中挑選人員，並為隊伍配備了全套日軍單兵夏季裝備與電台設備。趙尚志啟程回東北之前，莫斯科還專門派人代表蘇聯政府為之送行。1939年7月初，趙尚志率隊經佛山縣(今黑龍江省嘉蔭縣)一帶返回東北<sup>⑭</sup>，其後一面着手推動東北抗日運動的統一領導，另一面則積極開展對日情報工作，並與蘇方建立了密切的情報往來。

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蘇軍直接援助東北抗日運動。除趙尚志部，其他一些部隊也破天荒地第一次收到蘇軍的武器援助<sup>⑮</sup>。據隨趙尚志在東北進行游擊活動的于保合回憶，「當時蘇聯援助我們的裝備，盡量用繳獲的日本軍的裝備，盡量用東北的土布，攜帶的磁碗，都要把俄文字打掉，以免落入敵人之手，被敵人用做誹謗蘇聯的口實」<sup>⑯</sup>。東北抗聯第二路軍第二支隊支隊長王效明也回憶稱，蘇聯援助東北抗聯是從1939年開始的，他曾親自到蘇聯接收武器，第一次越境就接收了兩挺機槍、一萬發子彈和五十枚手榴彈<sup>⑰</sup>。得到

蘇聯武器彈藥和服裝援助的這些部隊，也同時領受蘇軍的偵察任務，並被要求以小部隊形式活動。值得注意的是，1939年5至9月，蘇日爆發了諾門罕衝突，此一衝突以及其引發的遠東戰爭危機，推動了蘇軍與東北抗聯的互動進程，而在7月間將趙尚志派回東北亦應有在戰時加強對日情報工作的考慮。

只是出乎蘇方預料的是，派遣趙尚志以東北抗聯總司令的身份返回東北，並未迅速實現東北黨與東北抗聯的統一領導，還在東北黨內引起軒然大波。北滿省委儘管不滿於蘇軍對趙尚志的任命，但對蘇方釋出的援助東北抗戰的善意都感到喜出望外，他們迅速對此做出反應，以尋求支持和指示。在獲悉趙尚志率隊回國之初，北滿省委就立即以尋求代為聯絡中共中央為事由給蘇方寫信，表示希望同蘇方建立直接聯繫，稱蘇方可以隨意、隨時來信，並請求蘇方提供各種書籍、文件、報紙等資料<sup>⑩</sup>。1939年12月，北滿省委書記金策以黨性原則接受了對趙尚志的任命，並要求所轄各獨立游擊部隊的黨委和支部予以接受，不得違抗<sup>⑪</sup>。

但此後趙尚志不經北滿省委和駐扎當地的東北抗聯第三路軍指揮部同意，而大刀闊斧地改編第三路軍的做法，很快引起了普遍不滿。僅僅一個月後，北滿省委就在趙尚志缺席的情況下開會，宣布永遠開除趙尚志黨籍，並號召北滿全黨反對趙尚志的「反黨反革命的行為和企圖」與「極端忌妒主義」<sup>⑫</sup>。以周保中為首的吉東省委亦認為，蘇軍這一任命忽視了東北黨的組織系統，並指責趙尚志、戴鴻賓二人是逃兵，所從事的完全是破壞東北抗日運動的活動<sup>⑬</sup>。

趙尚志在統一東北抗日運動過程中遭遇的阻力，反映出蘇方並不了解東北黨嚴重分裂的事實。除東北黨的分裂問題，當時東北抗日運動也正面臨完全失敗的危機，整個1938年東北抗聯的兵力損耗達十分之九<sup>⑭</sup>。如此情勢下，加上日偽方面的大肆招誘，東北黨內、軍中接連發生大批投降事件，其中包括相當比重的高級軍事將領和黨領導幹部。周保中1939年春的日記中經常流露出擔憂，他寫道：「不但平素革命軍隊基礎不穩的部隊大批叛降日賊，即較鞏固的中心軍隊亦起動搖，因日賊廣泛利用叛徒而動搖乃益見擴大，以至發生上級幹部重心領導幹部都起始動搖逃亡者，甚至無恥叛降日賊使日賊驅使。」<sup>⑮</sup>上述情形引起莫斯科的警惕。莫斯科收到的情報顯示，日軍情報機構已對東北黨、軍「嚴重滲透」<sup>⑯</sup>。

以上問題都極大損害了東北抗日運動的發展，並且致使蘇方不僅無法有效整合與放手利用這支抗日力量以開展對日鬥爭，還要防範日軍利用這些倒戈武裝威脅蘇聯的安全。此外，儘管1939年春莫斯科明令援助東北抗日運動，但遠東蘇軍與東北黨關於相互聯絡、援助、發出指示乃至東北抗聯官兵越境等問題，仍缺乏系統、原則性的規定，雙方互動頗不順暢。1939年冬，七軍一師政治部主任彭施魯與六軍一師殘部在日偽追擊下被迫越境後，就被蘇聯邊防軍逮捕並繳械，儘管周保中出面聯絡蘇方請求釋放，他們仍經歷了耗費時日的審查與頗為繁瑣的手續，到1940年2月脫離牢獄後仍不能回國。同一時期，第五軍軍長柴世榮及隨行官兵越境時也遭逮捕，被蘇軍指認有奸細嫌疑<sup>⑰</sup>。



上述情勢應是蘇軍召開第一次伯力會議的主要背景，其目的之一是整合東北抗日力量並為雙方關係確立原則。1939年11月底周保中趕到伯力開會時，被蘇軍代表當面告知：他們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將要幫助東北抗日運動，首先幫助解決黨內問題<sup>26</sup>。蘇軍代表給馮仲雲的解釋更明確，稱以往雙方關係太複雜，致使許多工作頗受影響，如今上級決定改變以往狀況，設專人負責一切，將在政治、組織、物質及事務上盡最大努力援助東北抗日運動，但前提是東北抗日運動需要統一<sup>27</sup>。這也再次印證蘇方最初的不了解東北黨內情形，東北黨的嚴重分裂已影響到蘇聯遠東戰略的實施，致使蘇軍不得不決心幫助東北黨達成統一。遠東情報機構1940年9月提交莫斯科的報告中，對東北抗聯的描述正是「我們改編過的」<sup>28</sup>。

## 二 第一次伯力會議中蘇軍與東北黨、軍的互動

為召集會議，蘇軍先是給周保中去信，並先後三次派交通員去通知周保中到蘇聯開會。在給周保中的信中，蘇方特別提到北滿代表亦將參會，一同討論東北抗日運動的全盤問題<sup>29</sup>。與此同時，蘇方積極尋找北滿代表。當時北滿省委失去了與各方的聯繫。馮仲雲被北滿省委派到蘿北縣興東鎮一帶兼任第六軍政治部主任，他考慮到時任下江特委書記高禹民與蘇方有聯繫，令其赴蘇以尋求聯絡中共中央的渠道。兩個月後，高禹民從蘇聯返回並轉告馮仲雲，稱蘇方要求他們一同前往伯力開會，於是馮仲雲才有代表北滿參加第一次伯力會議的機會。這也證明此次伯力會議並非東北黨事先議定的。馮仲雲的初衷只是尋求聯絡中共中央，但在機緣巧合下竟代表北滿省委參加伯力會議，他事後回憶蘇軍根本沒有要幫其聯絡中共中央的打算<sup>30</sup>。

護送馮仲雲、高禹民一行越境的，是後來在北安省海倫縣（今黑龍江省海倫市）叛降日軍的東北抗聯第三路軍副官夏振華（夏文波）。夏振華完成這次護送任務之後，再次接受王新林的命令，攜帶王新林寫給趙尚志及陳紹斌的密令，返回東北迎接趙尚志、陳紹斌一行<sup>31</sup>。1939年12月，趙尚志接到了命令，並獲悉馮仲雲已到蘇聯。他感到東北抗聯第三路軍的陳紹斌可能叛變而司令部駐地或已暴露，遂先將部隊處境通報蘇方，請求允許部隊一起越境。獲蘇方允許後，他即率部於蘿北縣興東鎮北部越境，其後隻身前往伯力，隨行人員則被安置在一處集體農莊內接受審查與整訓<sup>32</sup>。

如前所述，1939年11月末周保中已經抵達伯力。1940年1月17日，吉東、北滿等主要領導人首次集體越境蘇聯，在伯力坐到一起開會。蘇軍代表先是讓周保中、馮仲雲和趙尚志分別談話，就吉東、北滿共同關心的重要問題舉行會談。蘇軍代表參加了其中部分會談並分別同三人談話。在基本掌握東北黨內情形後，蘇軍代表就東北黨和東北抗聯的統一領導問題提出建議，即吉東與北滿黨組織合併、第二路軍與第三路軍實現統一領導和統一指揮，而後在民主集中制原則下選舉產生新的黨領導機關和軍事指揮機關<sup>33</sup>。根據

這一建議，1月20日，周保中、馮仲雲和趙尚志達成了〈中共吉東、北滿省委代表關於吉東、北滿黨內鬥爭問題的討論總結提綱〉，三人本着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原則，就黨內方針、軍事路線、組織領導等問題進行檢討，並就東北抗日運動的統一領導達成共識，即按照蘇方建議，首先實現吉東、北滿黨的統一，最終實現全東北黨組織的統一<sup>34</sup>。

1940年1月24日至2月4日，周保中、馮仲雲和趙尚志在蘇軍代表列席的情況下，對1936年以後的東北抗日運動歷史進行了系統總結，並討論了未來工作的開展。蘇聯代表為促成會議的順利進行，分別同三人有過長時間的談話。2月5日，會議第一階段結束，宣布休會。這一階段的討論決議全部交給蘇聯代表審查。休會期間，急切返回東北的周保中多次催促蘇方就決議內容作出指示<sup>35</sup>。

3月19日，會議第二階段在伯力市郊的蘇軍駐地召開，由蘇軍主持，蘇方參會者包括聯共(布)遠東邊疆區負責人、遠東蘇軍負責人和駐伯力、雙城子(俄稱「烏蘇里斯克」)蘇軍負責人等。蘇軍領導人首先肯定了此前討論通過的決議，接着正式提出〈關於東北抗日游擊運動前途的指示提綱〉(以下簡稱「三月提綱」)。這份提綱為遠東蘇軍與東北抗日運動的相互關係確立了原則，核心是遠東蘇軍將對東北抗日運動擔負起黨、政、軍及其組織的指揮責任，推動建立統一的指揮體系，雙方將通過電台、派遣交通員，以及派駐全權代表等方式，建立彼此之間穩定的聯絡機制。

「三月提綱」還就東北抗日運動的戰略部署、後勤工作、根據地建設、偵察工作、群眾工作、宣傳工作等提出主張，包括要求東北抗聯避免與日偽軍隊進行大規模作戰，而改以小部隊活動為主要鬥爭形式，盡力保存有生力量；應當重視情報偵查工作，經常性地開展偵查活動，如透過群眾基礎進行情報偵察。提綱還特別要求肅清東北黨和東北抗聯內部的日本奸細，並對部隊官兵越境問題做出嚴格限定。周保中、趙尚志和馮仲雲對提綱的內容表示



周保中將軍像(資料圖片)

完全同意，承諾將在工作中予以全部執行<sup>36</sup>。周保中是三人中最為積極的一個，他認為蘇軍援助與指導是東北抗日運動前途的重要保障，為此說服馮仲雲與趙尚志，在不妨礙中共組織原則與政治威信的前提下，將偵獲的日軍情報通報蘇軍<sup>37</sup>。

關於同蘇方建立關係的性質，周保中與馮仲雲聯署發給中共中央的信中稱之為「非常之時」的無奈之舉。他們一面稱與蘇方建立聯繫使得東北黨「得到相當有力的政治領導和工作幫助」，黨內問題基本解決；另一面強調對蘇關係不能取代東北黨組織系統，東北黨的工作仍寄望於同中共中央直接聯繫而得到解決<sup>38</sup>。1940年底，周保中也向蘇軍表達了東北黨工作的這兩層涵義：東北抗日運動不論情勢如何，根本屬於中國革命的一部分；接受蘇軍領導是暫時的特殊狀態，東北黨仍將依照中共中央的戰略和策略來決定自身工作原則<sup>39</sup>。1941年初，他寫給東北抗聯第一路軍的魏拯民的信也提到，東北黨對蘇關係既未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又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只是根據鬥爭需要建立的臨時性「秘密工作聯繫」，東北黨的基本立場仍是維持中共黨組織的獨立性與中共中央民族解放戰爭的政治策略<sup>40</sup>。

### 三 「三月提綱」在東北的落實情況

1940年3月下旬，周保中、趙尚志和馮仲雲返回中國東北，傳達、落實伯力會議的指示。趙尚志不再擔任東北抗聯總司令，並從北滿轉赴吉東的第二路軍，擔任副總指揮。3月27日，周保中攜帶蘇軍提供的電台設備和現金，在蘇軍代表護送下率隊越過烏蘇里江進入虎林。4月1日，抵達駐地的周保中同伯力蘇軍正式建立電台聯繫。2日，他在駐地召開東北抗聯第七軍的黨代表大會，要求將「三月提綱」作為今後一切工作的原則性方針。8日，周保中派副官張鳳春、陳學山到伯力向王新林匯報會議決定以及蒐集得來的虎林、饒河一帶的日軍情報<sup>41</sup>。4至10月間，由周保中率領的七十多人部隊同蘇方進行穩定、密切的往來通信，其中周保中向王新林發送了七十多封電報，兩次派出交通員，匯報了大量重要的情報。此外，部隊還三次破壞了日偽鐵路運輸<sup>42</sup>。

周保中發給王新林的電報內容大體包括三類：第一，關於黨和軍隊的內部事務，包括部隊調動、人員及機構調整等。如4月6日報告了對第七軍的整頓問題，包括判處第七軍代理軍長景樂亭死刑；5月23日詢問趙尚志因被北滿省委開除而衍生的黨籍問題；6月23日電報請求協助聯絡中共中央等。第二，如上所述，完成蘇方下達的偵察任務後，報告對敵作戰情形與日軍軍情。第三，請求援助。如4月9日至5月17日期間，曾多次請求獲得糧食、鹽和電池；6月22日請求獲得文件、子彈、軍裝等物資<sup>43</sup>。期間，王新林發給周保中二十餘封電報，主要是下達偵察任務和指示。對於周保中請求的物資，蘇方一般予以滿足<sup>44</sup>。

5月20日，東北抗聯第三路軍總指揮張壽錢接到馮仲雲帶回的「三月提綱」後專門致信王新林，他將提綱比喻成指南針，並高度評價與蘇方（他稱為「上

級)「工作上領導的關係」,表示已經開始認真執行提綱。他還詳細介紹了第三路軍以及自己的情況,一再稱自己是斯大林主義的信徒,懂得共產國際的原則指示<sup>④</sup>。6月24日,北滿省委在給蘇軍(名義上是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強調北滿省委完全贊同提綱的內容,並決定在全部工作中予以徹底貫徹。北滿省委還直言蘇方是「組織靠山」,盛讚蘇方的指示,稱「已經找到了組織靠山——上級,我們已經有了行路的明燈——這次指示信。這一個靠山的明燈,給我們增添了何等的信念和勇氣啊!」<sup>④</sup>

張壽錢承諾將在部隊改編、幹部分配、鬥爭策略等問題上接受提綱精神,包括接受蘇方提出的關於馮仲雲擔任第三路軍政委的任命建議,以及同意重新討論趙尚志黨籍問題<sup>④</sup>。在情報工作方面,張壽錢向蘇方保證將根據提綱改善部隊的「偵探工作」<sup>④</sup>。嗣後,王新林覆信張壽錢,就情報工作的展開提出詳細、具體的建議。王新林要求絕不停止情報工作,並指出這項工作不僅可以鞏固東北抗日運動與群眾的聯繫,還可預先掌握敵人的計劃而避免困難;也規定了蘇方需要的情報內容,包括有關日偽軍的布防、軍事行動、地圖文件、軍事文件,以及涉及機場、軍庫、道路、橋樑和軍營等資料。他還要求在捕獲俘虜時首先通告蘇方,在沒有接到蘇方答覆之前不得擅自釋放<sup>④</sup>。

儘管北滿與吉東省委都積極接受了「三月提綱」,同蘇軍建立了聯繫並接受下達的情報工作任務,但東北黨和東北抗聯的統一領導問題卻遲遲未能解決,仍在各自為政、各自為戰。自伯力回程時,周保中曾與馮仲雲再三相約,商定將在王新林協助下建立相互聯絡的渠道,4月初他即就此請求王新林協助。此後,周保中還以北滿距伯力更近,建議北滿負責發送通報聯絡密電,再經王新林轉寄吉東<sup>④</sup>,但問題並未解決。北滿省委6月29日的報告同樣指出,尚不能立即建立與吉東方面的聯絡渠道,仍需等候一段時間<sup>④</sup>。7月中旬,金策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甚至建議由中央代為聯絡吉東,在吉東和北滿之間傳遞消息和資料以配合行動<sup>④</sup>。7月底,周保中派趙尚志到蘇聯見王新林,目的之一就是請蘇方提供便利,使吉東省委能直接聯絡北滿方面,以及迅速恢復同南滿方面的聯絡<sup>④</sup>。

不僅東北黨、軍未能實現統一領導,蘇軍在現實工作中的一些做法也日益引起東北主要領導人的不滿。雙方在伯力達成的共識與「三月提綱」不僅嚴格規定了東北抗聯的越境問題以及對蘇關係,對蘇方行為也作出原則性規定,要求蘇方必須通過東北抗聯路軍總部保持單一系統,任何機構如不經路軍總部,不得與部隊官兵產生工作關係。然而,蘇軍並未嚴格遵循這些規定,雙城子蘇軍甚至嚴厲責成王效明部與之保持聯絡,要求虎林以南的東北抗聯官兵與之保持聯絡並承擔任務。4月6日,周保中就向王新林質問蘇軍擅自聯絡南野營官兵的問題<sup>④</sup>。他還向王新林着重指出,蘇軍的行為不僅違反了約定,還妨礙了東北抗聯的組織系統,要求加以糾正。他強調,蘇方如有工作需要東北抗聯官兵配合,必須要由伯力蘇軍和路軍總部基於「共同關係下原則決定之」<sup>④</sup>。

6月12日,周保中與趙尚志在聯署給王新林的信中再次抱怨蘇軍違反「三月提綱」中的原則,經常隨意拘捕與派遣東北抗聯官兵,稱如此不僅忽視了東北抗日運動本身的需要,更侵犯了那些官兵的人權。他還指出,蘇軍隨意扣押



交通員並檢查秘密信件，導致很多緊急事務被延遲，已經影響到游擊鬥爭的展開<sup>⑤</sup>。7月23日，在事先未請示王新林的情形下，周保中派趙尚志作為全權代表越境接洽。他在轉交王新林的信中開頭即交代了此行的緣由：很難及時、迅速得到蘇方必要的指示<sup>⑥</sup>。然而直到9月，相互聯絡問題仍未解決，周保中仍在向王新林抱怨因交通員不能及時返回而耽誤部隊行動的問題，稱「你對於交通員派遣歸回的時期太緩慢了；對於我們的困難環境的估計不充分。同時你對於我方的工作指導是相當的不夠的」<sup>⑦</sup>。

除了以上問題，東北抗聯的鬥爭環境也在持續惡化。儘管得到了蘇軍的援助和指示，但部隊物資仍極度缺乏，各游擊隊活動單位日漸減少，游擊隊人數銳減。周保中6月中旬就對王新林明白表示，若無蘇軍援助，東北抗日運動的失敗是必然的，他請蘇方站在「代理我們的革命指導者指南的立場」上提供必要的援助<sup>⑧</sup>。9月11日，周保中在給王新林的信中，除了再次提出一系列請求（包括物資、相互聯絡、接收傷員等），還第一次正式提出由蘇軍集合、整頓東北抗聯殘剩武裝的建議，「請你收集東北游擊隊殘存的力量，蓄備和組織與東北四省有關的鬥爭力量。應付不久到來的新局面」<sup>⑨</sup>。周保中的建議印證了當時東北抗日運動的嚴峻形勢。15日，金策在考慮第三路軍任務與行動時，提出過冬問題已成為刻不容緩需要解決的問題<sup>⑩</sup>。1940年冬，由於糧食的極度缺乏，東北抗聯第七軍參謀長崔石泉（崔庸健）甚至餓得無法行軍，只能由兩名戰士架着走路<sup>⑪</sup>。

蘇方非常清楚東北抗日運動的嚴峻情形，認為東北抗聯沒有蘇軍的幫助是不可能繼續鬥爭的<sup>⑫</sup>。更令蘇方警惕的是，根據掌握的情報，雖然在「三月提綱」中強調東北抗聯需肅清奸細，但仍被日軍全面滲透。9月，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內務局的一份報告指出，日軍奸細以更精準的方法從內部瓦解東北抗聯，尤其是組建了冒牌的東北抗聯部隊，深入蘇聯腹地進行軍事偵察。報告提到，這些冒牌部隊通常能混過蘇聯邊防軍的審查並取得蘇方的信任，之後會滲透到「我們領導滿洲游擊運動的指揮中心」。報告建議立即清洗東北抗聯，將奸細帶到蘇聯審判<sup>⑬</sup>。1940年全年，哈巴羅夫斯克邊防地區的蘇軍就逮捕了二百五十多名日軍間諜<sup>⑭</sup>。鑒於此，王新林在9月7日指示張壽鏞加強對間諜的警惕，並向其通報了已掌握的日軍組建冒牌游擊隊的消息，當月他也囑咐周保中警惕隊伍中的日本奸細和防範軍事機密洩露<sup>⑮</sup>。

## 四 內外交困下的第二次伯力會議

1940年秋，國際、遠東以及中國東北局勢都發生重大變化。9月，德、意、日簽署三國同盟條約。同月，蘇聯國防人民委員鐵木辛哥（Semyon Timoshenko）與總參謀長梅列茨科夫（Kirill Meretskov）在給聯共（布）中央的報告中，詳細闡述了日軍大規模入侵蘇聯的危險，指出日軍能在遠東地區集結超過50個步兵旅、1,200輛坦克和3,000架飛機，而全部的坦克、飛機以及至少30個步兵旅在二十五至三十天內就能完成集結，建議大本營盡速整編一切可以幫助增

強蘇聯國防安全的力量<sup>⑥</sup>。與此同時，大量有關日軍挑起邊境衝突的情報被送到莫斯科。鑒於這種形勢，總參謀部偵察局局長戈利科夫 (Filipp Golikov) 建議國防人民委員部加強援助中國抗戰，包括培養中國東北的情報人員<sup>⑦</sup>。

無論是加強遠東情報工作，防範日軍可能的入侵行動，還是幫助東北抗日運動，都令蘇軍感到有必要召集第二次伯力會議。1940年9月，王新林向東北黨「一切軍事領導者、政治委員和黨書記或黨委」發出參會邀請，包括第一路軍(南滿)楊靖宇、魏拯民，第二路軍(吉東)周保中、趙尚志、王效明，第三路軍(北滿)張壽錢、馮仲雲，以及第五軍柴世榮、季青等<sup>⑧</sup>。為確保他們按時到伯力參會，王新林將會議稱為「黨和游擊隊之幹部會議」，強調這次會議將決定「全軍和全中國人民之命運」，並稱將有中共中央代表參會。他信誓旦旦地稱中共中央代表將於1940年12月初前來，要求參會者必須在此之前抵達<sup>⑨</sup>。對於已經同中共中央失掉全部聯繫的東北主要領導人，僅僅能見到中央代表這一點就足以令人振奮。

1940年11月初，接到邀請的一些東北黨和東北抗聯領導人相繼越境。王新林還派當時在蘇聯的夏振華前往北滿作口頭傳達，要求張壽錢、金策、馮仲雲和許亨植選擇一人留守，其餘三人赴蘇參會。北滿省委最終決定由許亨植留守，在會議期間擔任指揮並負責與蘇方聯絡的電台<sup>⑩</sup>。11月23日，馮仲雲、金策一行動身前往蘇聯，12月3日越境，而張壽錢在11月25日越境<sup>⑪</sup>。張壽錢和馮仲雲、金策都是由夏振華護送的。吉東方面，11月3日，周保中及隨行副官陶雨峰等人經過一場艱苦戰鬥後渡過烏蘇里江，隨即被蘇軍隔離，至17日被蘇軍送往伯力，18日抵達<sup>⑫</sup>。

及至吉東與北滿代表抵達，南滿方面仍遲遲沒有代表前來。事實上，當時東北抗聯第一路軍總司令楊靖宇已經戰死，代理總司令魏拯民病重並失去聯繫。王新林發給南滿省委的指示信還被同屬第一路軍的徐哲擅自越權拆看並隱瞞起來，後者甚至決定自己前往伯力參會。除徐哲外，還有孫榮煥也到伯力，謊稱自己是魏拯民派來的代表。周保中和王新林識破了徐哲和孫榮煥的謊言，將二人扣押審查<sup>⑬</sup>。直到12月11日，周保中偶然獲悉在蘇軍某邊防哨所的牆上寫着「×年×月×日，金日成到此」的字樣，19日請王新林費心尋找，最終找到1940年10月23日因越境被捕、正被蘇軍羈押的金日成及季青、尹峻山、安吉等一行人，將他們送到伯力，作為南滿省委和第一路軍代表參加會議，儘管金日成、季青多次強調自己並非第一路軍的最高負責人或全權代表，不掌握南滿全盤情形<sup>⑭</sup>。事實上，金日成等參加伯力會議純屬偶然。結合1941年1月1日金日成等向王新林提交關於第一路軍的報告，他們抵達伯力應是在1940年12月19日至31日之間<sup>⑮</sup>。

## 五 第二次伯力會議中蘇方的考量

參會代表陸續抵達伯力後，首先關心的是何時能見到中共中央的代表，他們都非常渴望重新建立與中共中央的關係，相互之間談論的也是這方面的

問題。然而，他們最終未能如願所償。1940年11月25日，遠東蘇軍司令部曾通告周保中，稱中共中央代表將於半月內抵達，要周保中立即準備報告提綱，然而到12月7日，蘇軍代表的態度就已經發生變化，開始對中共中央代表前來參會的問題「作來否未定之說」<sup>⑦</sup>。16日，蘇軍代表最終通告周保中和張壽錢，中共中央代表不可能前來參加會議<sup>⑧</sup>。在此期間，共產國際儘管與中共中央有密切往來，卻從未透露出任何有關這次伯力會議的消息。由此來看，蘇軍召集此次會議主要並不是幫助東北黨聯絡中共中央，至少沒有為此做過任何積極努力。

在發出的參會邀請信中，王新林一再叮囑參會人員盡可能帶上所掌握的各類情報，包括所轄各部情形的材料和日偽情報資料。他要求周保中和張壽錢在行前通報有關各部情形及日偽軍情資料，包括繳獲的各類文件與俘虜審訊記錄，並一再強調捕獲日偽俘虜後應首先通告蘇方，在未得蘇軍指示前不得釋放<sup>⑨</sup>。會前，蘇軍代表同參會代表多次進行私下談話。周保中抵達伯力的第二天，就被要求匯報東北抗日運動的狀況，並被囑咐「寫情報圖案及對滿洲腹部中心地帶之諜報法檢討」。從11月25日到12月7日，先後有十五名蘇軍代表（從校級軍官到將軍）接見了周保中，會談內容涉及東北軍事地理，寶清、勃利、富錦一帶的軍情，東北抗聯情報人員遴選等<sup>⑩</sup>。

會議期間，蘇軍主要進行的是統計、甄別與調查工作。除收集參會代表帶來的各種情報資料，王新林還要周保中、張壽錢及金日成等圍繞他事先擬定的十九個問題分別提交報告。或許是為確保報告的真實性，王新林特意指出這些報告將會轉交中共中央。1941年1月1至2日，吉東、北滿、南滿的代表分別提交報告。由於金日成等只是第一路軍的中階軍官，並不掌握南滿省委和第一路軍的整體狀況，更提不出任何緊要的、全域性的問題，他們提交的報告充滿了「不詳」、「沒有正確的統計」、「不能作具體的答覆」之類的表述<sup>⑪</sup>。不過，沒有任何迹象或史料能夠證明，王新林、遠東蘇軍以及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領導人將這些報告轉交給中共中央。

在被告知中共中央不會有代表參會後，周保中、張壽錢要求王新林重新說明召集會議的性質和任務，同時表明立場：既然中共中央沒有派來代表，東北黨將繼續執行「三月提綱」。他們請王新林協助召開東北黨代表預備會，以討論東北抗日運動的全域性問題<sup>⑫</sup>。獲得蘇方許可後，1月5日，周保中主持召開「滿洲全黨代表會議」，吉東、北滿、南滿分別派三名代表參會，蘇軍代表列席。與會人員一致認為，東北抗日運動的前途命運與蘇聯息息相關，並就尋求蘇方指導與援助達成共識<sup>⑬</sup>。只是從法理上講，這次會議決議未得到中共中央批准，並非最後決定。正如周保中會後給魏拯民的信中所稱，「可惜得很！我們這樣打算要從中共黨東北組織系統一致入手，進而解決其他一切問題，沒有做到。只是在王新林工作關係下召開了單純的東北游擊隊軍事、政治會議」<sup>⑭</sup>。

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 (Georgi Dimitrov) 密切關注是次會議進程。1月3日，他專門聽取了有關東北問題的匯報；16日，他同情報機構官員以及遠東蘇軍軍事委員一起討論了東北黨與東北抗聯的問題，最後決定敦促中共

中央組建中央臨時局和派代表到東北<sup>65</sup>。無獨有偶，此時在莫斯科養病的林彪也在向季米特洛夫提出加強東北工作的必要性，稱東北地區只有日軍和中共領導的游擊隊，將是未來中共軍隊的主要行動方向，並強調中共中央將「研究滿洲的情況、游擊隊的鬥爭經驗和通往滿洲的所有交通要道」。兩天後，季米特洛夫將林彪的信提交給蘇聯領導人斯大林、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日丹諾夫(Andrei Zhdanov)、伏羅希洛夫和鐵木辛哥<sup>66</sup>。

根據季米特洛夫的指示，2月24日，王新林召集周保中、崔石泉、馮仲雲、金策、金日成等人會談，部署派遣任務。會議商定了蘇方援助布匹、馬匹等物資和經費的數額及事項，決定派一百二十餘名東北抗聯官兵到雙城子蘇軍駐地集中訓練；金日成則被派回東北尋找魏拯民<sup>67</sup>。此時，季米特洛夫仍在敦促中共中央加強東北工作，尚未下定決心將東北抗聯的領導權交還中共中央。對中共中央派到東北的交通員王鵬(彭申年)的處理即是一例。周保中獲悉王鵬已經抵達吉東後，立即報告王新林，同時命令王效明親自審問，並在確認王鵬的身份後，向王新林提交了審問記錄。隨後王新林將王鵬帶到莫斯科，再無消息。周保中後來數次詢問王鵬的下落，均無結果<sup>68</sup>。

周保中在回答前述王新林提出的十九個問題的報告中，就「工作生活中游擊隊及聯共(布)黨組織之一切要求」提出三步建議：第一，在蘇軍領導與援助下完成東北黨組織的統一領導；第二，解決東北抗聯的統一指揮問題；第三，執行與完成蘇軍邊防偵察任務。他設想的雙方關係是將東北抗聯總司令部設在伯力，蘇方藉此領導東北抗日運動，對東北黨組織提供政治領導和工作援助<sup>69</sup>。這裏也可以看到，周保中此時設想的模式，仍是以保留原有東北黨和東北抗聯組織系統為前提。

圍繞這一問題，周保中與蘇方還發生了一些齟齬。起因是會議期間蘇方提出取消東北黨和東北抗聯組織系統。東北黨內部分人員對此表示贊同，甚至還公開提議由王新林擔任東北抗聯總司令指揮東北抗戰，以周保中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員則表示堅決拒絕。周保中指出，可以發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幫蘇軍收集情報，但絕不能只給蘇聯人做偵探，強調東北抗聯首先是愛國主義者，然後才是國際主義者<sup>70</sup>。據稱周保中當時拍了桌子，說「我們死也要腳朝西！」意思是寧願戰死東北(伯力位於中國東北的東北向)<sup>71</sup>。據周保中自己描述，正是經他的努力，東北黨、軍最終統一思想，迫使蘇方放棄上述要求，最終問題被提交到莫斯科<sup>72</sup>。3月17日，季米特洛夫在與共產國際幹部官員談包括「游擊隊領導幹部」問題的東北問題時，感覺「那裏極不順利」<sup>73</sup>，令其憂心的很可能是這一爭論。

儘管季米特洛夫感到「極不順利」，會議進程總體上仍符合蘇軍的原意。第一，會議重申了「三月提綱」，即蘇方保持對東北抗日運動非正常、臨時性的指導<sup>74</sup>。關於這種關係的性質，周保中有過專門解釋：蘇軍對東北黨的領導須依照中共中央現階段的政治方針；雙方關係是臨時性的；東北黨組織系統不改變；蘇方提出的任務須適合東北抗日運動的客觀條件；蘇方的指導與任務下達，都必須經東北抗聯的路軍總部指揮機關；雙方通過電台、派遣交通員保持聯繫，必要時可派駐全權代表<sup>75</sup>。



第二，蘇軍系統完成了對東北抗日運動的調查，對主要領導人也作了詳細審查。周保中、馮仲雲、金策等人都按蘇方要求填寫了履歷表，內容包括個人信息以及主要的革命經歷等<sup>⑥</sup>。履歷表都被譯成俄文提交給共產國際幹部部。共產國際幹部部則會同蘇軍情報機構，對履歷表進行專門核查，此外還專門徵詢了曾負責東北工作的蘇聯情報人員的意見，調閱了歷史資料，包括周保中在蘇留學期間被開除黨籍的調查資料、抗戰前擔任吉東特委書記的楊松在東北工作的報告等<sup>⑦</sup>。3月14日，共產國際幹部部提交了鑒定報告，指出周保中應對吉東省委存在的問題及東北抗日運動的低潮負責，但考慮到東北抗日運動極其缺乏軍事幹部，仍建議任命他擔任某些部隊的指揮官<sup>⑧</sup>。

從1940年12月到1941年3月，參會代表遵照蘇方要求提交了各類報告，如野營人員表，黨員名單，可繼續工作人員、殘廢人員、犧牲人員名單，越境人員武器表等。王新林還指示周保中編寫東北抗日運動簡史<sup>⑨</sup>。這些資料加深了蘇軍對東北抗日運動的了解，為蘇聯遠東邊防軍防範日本間諜的滲透提供了重要參考資料，也為日後整編東北抗聯以及派遣小部隊從事情報工作奠定了基礎。其後，這些報告連同蘇方各種調查報告被陸續提交到莫斯科。共產國際領導人、蘇聯情報機構以及遠東邊區相關黨政機構領導人，多次開會研討東北黨與東北抗聯的問題。這也證明，第二次伯力會議從召集到最終決議，都有蘇方的主導。儘管在歸編東北抗聯問題上出現一些波瀾，會議基本上按照蘇方的意圖進行。

第二次伯力會議的重要影響還體現在，越境參會的東北主要幹部絕大部分都未能在會後立時返回東北戰場，而是滯留蘇聯直至1945年9月抗戰結束。東北黨和東北抗聯上下當時普遍表達不滿。然而，周保中等東北主要領導人從保存抗戰有生力量的角度，最終決定接受蘇方這一要求，並促成黨內共識。這些主要幹部長期脫離東北戰場，並與蘇方決策深度綁定，對東北抗日運動產生了全域性的消極影響。1942年秋，遠東蘇軍將滯留遠東的東北抗聯官兵加以整合，編入蘇軍序列。1943年春，經過整編的東北抗日力量被禁止返回中國東北從事任何與中共黨或抗戰有關的事項。直到1945年9月抗戰結束後，這支力量才得以重返中國東北。第二次伯力會議這一根本影響到東北抗日運動前途與命運的重大決策，既無來自中共中央的任何指示，也沒有經過東北黨領導機關的任何討論，只是蘇方突然、單方面提出的要求。這也證明蘇方已經開始從遠東戰略而非中國革命與東北解放事業來審視與重新定位東北抗聯這支部隊。

## 六 結論

本文論述的基本觀點是，蘇方對兩次伯力會議的召開、進程及影響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其目的是要整合、掌握與利用東北抗日力量，服務於自身的新遠東戰略。東北主要領導人之所以兩次赴蘇開會並接受蘇方主張，主要是

希望得到蘇聯援助，以及在無法聯絡中共中央的情形下保障東北抗戰的前途。經過兩次伯力會議，蘇方不僅確定了與東北抗聯的關係原則，還全面了解與掌握了這支部隊，為其後的整頓、整編工作奠定了基礎。東北黨則如願得到了蘇方的援助和指導，此後依照蘇方提議調整了鬥爭策略。期間，以周保中為代表的東北主要領導人一再重申中共黨的獨立與自主性，只是受各種因素的制約，東北黨的命運與東北抗日運動的前途已然與蘇聯的遠東戰略纏繞在一起。

本文揭示，若要全面呈現東北抗戰的歷史進程，必須要有一種更為寬闊的國際視野，即將東北抗戰置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遠東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框架內進行觀察。不然，關於期間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描述必定是不完整的，而對其中諸多關鍵性問題的解釋也很難做到全面而準確。至於這一框架內的蘇聯對華政策研究，則亟需祛除由特定歷史條件與意識形態因素造成的迷霧，既應當看到蘇聯援華抗戰政策的對華友好與國際主義的一面，也要認清蘇聯對華行為邏輯中務實功利的一面。歸根結底，蘇聯援華抗戰政策的基本目標，是維護蘇聯自身的國家安全和現實利益，具體到對東北抗日運動的政策，則主要是防範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威脅。從這個意義上講，東北抗日運動的歷史變遷，可被視為當時蘇聯遠東戰略不斷演變的一個側影。

### 註釋

- ① 《東北抗日聯軍鬥爭史》編寫組：《東北抗日聯軍鬥爭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412-16、437-42；《東北抗日聯軍史》編寫組：《東北抗日聯軍史》，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5），頁869-77、933-38。
- ② 婁成普、任會斌：〈淺議兩次伯力會議與東北抗聯移師蘇聯的關係——以周保中《東北抗日游擊日記》為中心的考察〉，《東北史地》，2007年第2期，頁82-86；王連捷：〈東北抗日聯軍後期鬥爭若干問題的研究〉，《抗日戰爭研究》，2008年第4期，頁162-78；金興偉：〈1940年後的東北抗聯研究〉（中共中央黨校博士論文，2013）；王惠宇：〈東北抗聯與蘇聯遠東軍對日軍事偵察活動〉，《長白學刊》，2015年第6期，頁89-92；邵雍：〈「抗聯」教導旅初探〉，《史林》，2015年第6期，頁165-72。
- ③ 留希科夫叛逃後交代了有關蘇聯遠東軍事部署、組織系統、武器裝備等情報，包括註明防禦工事的蘇軍地圖和正在使用的無線電代碼本等。參見Алексей Павлюков, *Ежов. Биография* (Москва: Захаров, 2007), 117。
- ④ 〈駐赤塔總領館商務組電部日偽與蘇邊界衝突〉（1938年7月25日），載唐屹主編：《外交部檔案叢書：界務類》，第一冊，「東北卷」（台北：中華民國外交部，2001），頁155。
- ⑤ 共產國際認定滿洲省委內有日本間諜，已經變成日本間諜的分支機構。參見РГАСПИ（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ф.495, оп.225, д.2835, л.9-18；〈訪問楊光華同志記錄——關於撤銷滿洲省委、共產國際、統一戰線等問題〉（1965年9月16日），載中共黑龍江省委黨史研究所：《中共東北地方黨史資料訪問錄選編（滿洲省委及吉東特委專輯）》（內部發行，1981），頁96。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滿洲省委解散的罪責都落到了王明、康生頭上。參見孫治方：〈揭

發康生的幾個問題》，載會議秘書組：《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第二組(25)》(內部發行，1979)，頁1-3。

⑥ 〈周保中給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中共中央代表團的信〉(1938年2月20日)，載中央檔案館、東北三省檔案館編：《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種本(1929-1944)》(內部發行，1991)，頁225-44。《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分甲種本和乙種本，總計七十卷，本文所引分卷的編者均為中央檔案館、東北三省檔案館，均是1991年內部發行，後面引註不再一一標明。

⑦ 〈北滿省委給中共中央的報告〉(1939年6月15日)，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39.5-1939.12)》，頁19-43。

⑧ 〈趙尚志關於請求軍事指導和幫助等問題致蘇聯遠東軍司令及聯共軍黨委的信〉(1937年11月26日)，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37.2-1937.12)》，頁113-16。

⑨ 參見РГАСПИ, ф.495, оп.225, д.2835, л.9-18；〈趙毅民關於中共滿洲省委情況的報告〉(1938年12月7日)、〈林莎給共產國際幹部部的報告〉(1938年12月8日)，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種本(1929-1944)》，頁273-91。

⑩ РГАСПИ, ф.495, оп.225, д.138, л.19-29。

⑪ 〈周保中關於工作聯繫問題給王新林同志的信〉(1939年1月8日)，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39.1-1939.4)》，頁7-13。編者推斷的時間可能是錯的，這封信不可能是1月8日寫的，原因是周保中在信中稱「我在今年五月初，才從牡丹江方面來到寶清」。王新林(俄文名Ван Син Линь)原是一名蘇聯軍官，惟後來擔任遠東蘇軍情報負責人這一職位的蘇聯軍官，都繼續使用「王新林」作為中文名。

⑫⑬⑭⑮⑯⑰ *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ом I, Накануне К. 1 (1938.11-1940.12) (Москва: А/О «Книга и бизнес», 1995), 36-37; 259-66; 259-66; 259-66; 253-59.*

⑱ Север Александр и Колпакиди А. Иванович, *Спецназ ГРУ. Самая пол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язуа, 2012), 291；林京生：《戴鴻賓傳》(未刊本)，頁315。

⑲ 李龍、郭福太整理，中共黑龍江省湯原縣委黨史研究室編：《風雪松山客：于保合回憶錄》(內部發行，1998)，頁96-97；〈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通令(第16號)〉(1939年7月1日)，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39.5-1939.10)》，頁123。

⑳㉑㉒㉓㉔㉕ 〈周保中給王新林的信〉(內部資料，1943年6月1日)。

㉖ 〈訪問于保合同志記錄〉(1960年5月29日)，載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地方黨史研究所：《東北地方黨史資料·訪問錄選編(抗聯三軍專輯)》(內部發行，1980)，頁27-40。

㉗㉘ 〈訪問王效明記錄：「七七」後東北抗戰形勢和抗聯第二路軍〉(1960年7月25日)，載中共吉林省委地方黨史資料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在東北地區的革命活動回憶錄》，第三輯(內部發行，1964)，頁碼不詳。

㉙ 〈中共北滿省委關於委託轉送文件事給遠東軍負責同志的信〉(1939年7月15日)，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39.5-1939.12)》，頁45-46。

㉚ 〈中共北滿省委給各獨立游擊部隊黨委、支部的通知——關於任命趙尚志為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問題〉(1939年12月26日)，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39.5-1939.12)》，頁189-90。

㉛ 〈中共北滿省委關於永遠開除趙尚志黨籍的決議〉(1940年1月28日)，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40.1-1940.9)》，頁7-9。

㉜ 〈馮仲雲給中共中央的工作報告：五年來北滿反日運動之發展〉(1939年10月12日)，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39.5-1939.12)》，頁143；〈中共吉東省委抄發吉東黨組織省委執行部周保中關於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目前嚴

- 重階段的鬥爭任務緊急通知) (1939年7月10日), 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31.3-1941.4)》, 頁61-69。
- ⑳ 《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37.11-1939.10)》, 頁232-34。該卷所錄檔案為周保中日記, 未有具體篇名。
- ㉑ 《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39.10-1941.12)》, 頁64-65、72。該卷所錄檔案為周保中日記, 未有具體篇名。1940年3月, 身處伯力的周保中才從王新林口中獲悉柴世榮被逮捕的消息。他甚為詫異, 當即請王新林幫助打聽詳情, 並一再保證柴世榮絕無叛變嫌疑。然而直至周保中回國, 蘇軍仍未釋放柴世榮。
- ㉒ 〈馮仲雲給金策並轉北滿省委及張壽錢的信〉(1939年10月8日), 載國家圖書館中國記憶項目中心組織編撰, 史義軍編寫:《馮仲雲年譜長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9), 頁163-66。
- ㉓ 馮仲雲:〈我的自傳〉, 載《馮仲雲年譜長編》, 頁162-63。
- ㉔ 參見〈夏振華履歷書〉(內部資料, 1941年1月);〈關於審問歸降之武裝謀者夏文波(前抗日第三路軍副官)〉(內部資料, 1942年7月16日)。
- ㉕⑤⑥⑦⑧ 《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39.10-1941.12)》, 頁64-65; 59-60; 87-88; 273、282; 269、272-83。
- ㉖ 〈馮仲雲給中共中央的工作報告〉(1939年10月12日), 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39.5-1939.12)》, 頁147-50。
- ㉗ 〈中共吉東、北滿省委代表關於吉東、北滿黨內鬥爭問題的討論總結提綱〉(1940年1月20日), 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31.3-1941.4)》, 頁75-79。
- ㉘ 〈海路、王新林給周保中、趙尚志、張壽錢、馮仲雲的指示綱領〉(1940年3月19日), 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40.1-1940.7)》, 頁137-46。
- ㉙ 〈中共吉東、北滿省委代表周保中、馮仲雲給中共中央的信〉(1940年3月24日), 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31.3-1941.4)》, 頁131-32。
- ㉚⑳ 〈周保中張壽錢給王新林的信〉(內部資料, 1940年12月20日)。
- ㉛⑳ 〈周保中、金策給魏拯民的信〉(1941年3月12日), 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41.2-1941.10)》, 頁105; 103-104; 103-21。
- ㉜ 《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39.10-1941.12)》, 頁79;〈西返經過紀要〉(1940年4月), 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40.1-1940.7)》, 頁231-38。
- ㉝ 〈周保中給王新林的信〉(1942年4月2日), 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42.1-1942.5)》, 頁407-11。
- ㉞ 1940年3月26日, 景樂亭被東北抗聯第二路軍第二支隊以「企圖叛降」罪處以死刑。1993年10月23日, 中共黑龍江省委黨史研究室、東北烈士紀念館聯合出具證明, 指出「經查檔案資料, 當時的罪名是不存在的, 係因未能弄清事實, 倉促決定造成的, 屬內部誤殺」, 建議追授景樂亭為革命烈士。參見〈關於景樂亭同志歷史問題的考察意見〉(內部資料, 1993)。關於周保中給王新林發出的六十七封電報, 參見《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39.10-1941.12)》, 頁87-115。
- ㉟ 關於王新林給周保中發出的二十三封電報, 參見《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39.10-1941.12)》, 頁115-23。
- ㊱⑳ 〈張壽錢給王新林等同志信〉(1940年5月20日), 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40.1-1940.7)》, 頁263-74。
- ㊲⑳ 〈中共北滿省委給海路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報告〉(1940年6月29日), 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40.1-1940.9)》, 頁205-22。
- ㊳ 1940年1月北滿省委作出決議將趙尚志「永久」開除黨籍。後在蘇方和周保中多次過問下, 5月1日, 張壽錢同意將「永久」字樣取消。參見〈張壽錢、張蘭生給北滿省委的信〉(1940年5月1日), 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40.1-1940.9)》, 頁135-38。十一屆三中全會後, 中共中央複查趙尚志的黨



籍問題，以「中央沒有接到任何有關開除趙尚志黨籍的文件資料」，不承認趙尚志有黨籍問題。中共中央組織部此後委託黑龍江省委進行複查。1982年6月8日，中共黑龍江省委常委會作出決議，決定恢復趙尚志的黨籍並為其恢復名譽。參見《風雪松山客》，頁111-12。

- ④⑨ 〈王新林給張壽錢的信：幾點工作建議〉（1940年9月7日），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37.6-1940.10）》，頁441-43。
- ⑤⑩ 〈西返經過紀要〉，頁231-38；〈第二路軍總指揮周保中關於迅速建立北滿、吉東直接通報聯繫等問題給張壽錢等人的信〉（內部資料，1940年6月6日）。
- ⑤⑪ 〈金策給海路並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40年7月7日），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40.1-1940.9）》，頁225-28。
- ⑤⑫⑬ 〈周保中給王新林的信〉（1940年7月23日），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37.6-1940.10）》，頁253-55。
- ⑤⑭ 〈西返經過紀要〉，頁231-38。
- ⑤⑮⑯ 〈周保中趙尚志給×××的報告信〉（1940年6月12日），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37.6-1940.10）》，頁203-19。
- ⑤⑰⑱ 〈周保中給王新林的信〉（內部資料，1940年9月11日）。
- ⑤⑲ 〈金策關於三路軍的任務與行動及東北統一領導問題的意見書〉（1940年9月15日），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40.1-1940.9）》，頁251-60。
- ⑤⑳㉑ 〈周保中給王新林的信〉（內部資料，1941年5月10日）。
- ⑤㉒ *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ом I, Накануне К. 2 (1941.1-6.21) (Москва: А/О «Книга и бизнес», 1995), 36-38。*
- ⑤㉓ 〈王新林給張壽錢的信〉（1940年9月7日），頁441-43；〈王新林給周保中的信〉（內部資料，1940年9月28日）。
- ⑤㉔ РГАСПИ, ф.495, оп.74, д.618, л.12-16; РГВА (俄羅斯國家軍事檔案館), ф.4, оп.19, д.69, л.60-61, 65, 68-70, 72-73。
- ⑤㉕ 〈王新林給周保中的信〉（1940年9月28日）。
- ⑤㉖ 〈王新林為召開黨和游擊隊幹部會議給各軍指揮的指令〉（1940年9月30日），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40.9-1940.12）》，頁287-90。
- ⑤㉗ 由於許亨植身在南河未能及時收到消息，北滿省委最後決定許亨植留守，馮仲雲、金策在行前專門留信給許亨植解釋：「時間匆促，無法等候你」，「你還在南河，來也趕不上了，因此只有留你在此了」。然而，伯力會議期間，張壽錢卻向周保中和蘇聯代表表示，北滿省委決定由馮仲雲留守，馮仲雲託辭沒有留守。馮仲雲則認為這是張壽錢對他的「攻擊、排擠、詆毀、誹謗」。參見《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39.10-1941.12）》，頁287；〈張壽錢的意見書：要求撤銷馮仲雲的職務〉（1941年2月14日），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41.2-1941.10）》，頁53-58；〈馮仲雲的申明書〉（1941年2月14日），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32.6-1942.11）》，頁113。
- ⑤㉘ 〈馮仲雲給王新林的信：請派人解決給養等問題〉（1940年12月），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40.9-1940.12）》，頁233-34；《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39.10-1941.12）》，頁272、277。
- ⑤㉙ 《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39.10-1941.12）》，頁266。當時東北瘟疫流行，蘇聯遠東邊區政府要求凡由東北入境者，都要在邊防軍駐地隔離十日，周保中一行人因此被邊防軍隔離觀察。
- ⑤㉚ 〈周保中、金策給魏拯民的信〉，頁103-10。1941年3月8日，魏拯民病逝於樺甸縣牡丹嶺西麓密營中。徐哲為何仍以南滿與第一路軍代表參會，筆者尚未掌握令人信服的史料。
- ⑤㉛ 〈周保中致王新林同志的信〉（1940年12月19日），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種本（1929-1944）》，頁297-98。季青回憶這段歷史時提到，他是接到蘇方電報才啟程的。至於他為何未如周保中等人被直接送往伯力，仍待發掘更多史料。以往關於金日成參加第二次伯力會議的表述分為兩類：第一，朝鮮當局

稱金日成參會是接到共產國際的通知，同時受魏拯民的委託。參見金日成：《金日成回憶錄：與世紀同行》，第八卷（平壤：外文出版社，1998），頁47-48。第二，國內研究者稱，金日成、徐哲、安吉於1940年11月率第一路軍餘部越境，經提議作為南滿正式代表。參見《東北抗日聯軍鬥爭史》編寫組：《東北抗日聯軍鬥爭史》，頁440。

⑩ 參見〈東北抗聯第一路軍越境人員統計表〉（1943年2月），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42-1945.7）》，頁115-38；〈周保中致王新林同志的信〉，頁297-98。金日成越境是違反東北黨紀律的，並為此受到責罰。1941年3月2日，周保中、金策寫給魏拯民的信就指出金日成越境蘇聯，是「直截了當的脫離第一路軍總部、放棄游擊隊支持鬥爭的可能條件」，犯了「不能容許的錯誤」，必須要在紀律上給予「相當的處罰」。參見〈周保中、金策給魏拯民的信〉，頁103-10。

⑪ 〈周保中張壽錢給王新林的信〉。普通官兵獲悉沒有中共中央代表參會，到1941年3月，普遍感到上當受騙。參見〈季青談抗聯為何過界的問題和兩次伯力會議〉（內部資料，1981年10月16日）。

⑫ 〈王新林給周保中的信〉（1940年9月28日）；〈王新林給張壽錢的信〉（1940年9月7日），頁441-43。

⑬ 〈金日成、安吉、徐哲給王新林的報告〉（1941年1月1日），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40.12-1941.7）》，頁95-105。

⑭ 〈滿洲新形勢估計和游擊運動的前途及任務〉（1941年），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41.5-1942.11）》，頁279-87。周保中首次提出了對未來東北政權形式的設想，即在蘇聯幫助下建立類似「外蒙古式之人民共和國（但由中國東北共產黨領導），抑建立陝甘寧邊區式的政權」。

⑮⑯ 〈季米特洛夫日記（節錄）〉（1941年），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38-1943）》，第二十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頁712、714；722。

⑰ 〈林彪給季米特洛夫的信〉（1941年2月5日），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室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937-1943.5）》，第十九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頁140-41。

⑱ 〈季米特洛夫日記（節錄）〉，頁720；〈周保中、金策給魏拯民的信〉，頁104。

⑲ 〈周保中給王新林的信〉（1941年4月27日），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41.2-1941.10）》，頁169-70。

⑳ 〈周保中給王新林的報告〉（1941年1月2日），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40.12-1941.7）》，頁107-36。

㉑ 〈周保中給王新林的信〉（1941年5月10日）；〈季青談抗聯為何過界的問題和兩次伯力會議〉。

㉒ 季青：〈關於抗聯小部隊的派遣、活動與作用——在東北抗日聯軍小部隊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遼寧黨史資料通訊》，1984年第8期，頁29-37。

㉓ 〈訪問周保中同志記錄〉（1960年9月），載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地方黨史研究所：《中共東北地方黨史資料·訪問錄選編（周保中同志專輯）》（內部發行，1980），頁113。

㉔ РГАСПИ, ф.495, оп.225, д.138, 頁碼不詳。

㉕ РГАСПИ, ф.495, оп.225, д.138, л.65-68, 90-93.

㉖ РГАСПИ, ф.495, оп.225, д.138, л.19-29.

㉗ 〈周保中給金策、馮仲雲、崔石泉的信〉（1941年4月27日），載《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41.2-1941.10）》，頁171-72。